

黄侃诗文概谭

沈祥源

“斜阳里，瘦影待谁怜？人意已随流水远，秋声先伴暮蝉还，憔悴又今年。”将这首《江南好》置于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等古代名家词集中也毫不逊色。谁能料到，它却出自于近代学者黄侃先生之手，实在令人惊叹不已！

黄侃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和卓越的国学大师，也是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。他的诗文创作，无论数量质量，与同时代写旧体诗文的作家相比，都属上乘，在近代文学史上，理应占一席之地。遗憾的是这一点尚未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。

笔者曾参加过黄侃诗文的整理工作，本文就从这里说起。1985年武汉大学成立了黄侃诗文遗稿整理小组，胡国瑞教授任指导，我任组长，成员有王庆元、李中华和罗立乾。关于整理情况，当时小组曾有一份汇报材料，现摘录如下：

整理工作从1985年10月正式开始，经过一年半的努力，现已基本完成，编辑了《黄侃诗文集》书稿一部。

集子分文、诗、词三部分，约30万字，凡诗1552首，词418首，文和赋158篇。

各部分整理人员：

第一编 文、赋——王庆元

第二编 诗——李中华、罗立乾

第三编 词——沈祥源

最后由沈祥源统稿、编目，胡国瑞审阅。

黄侃诗文遗稿以前也有人整理过，现存的手抄本也较多，仅我们所见，就有《量守庐诗钞》、《量守庐词钞》、《量守庐文集》等十余种。其中既有作者自己的手迹，也有亲朋移录的。各种集子都零星杂乱，或诗词文赋混录，或某一作品重见错出，或各本文字互异，或排列次序杂乱，或字迹模糊不清。总之，还未见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钞本。

1985年为纪念黄侃诞生100周年和逝世50周年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湖北文史馆校订的《黄季刚诗文集》一书，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本子，可说是集以往各编之大成，这对我们进一步整理黄氏诗文遗稿帮助很大。

我们整理的依据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所收藏的黄侃诗文的各种钞本、手稿和排印本，并以黄焯先生所校录的钞本为底本，参照其他传钞本和排印本而编订。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
一、参照众本，爬罗剔抉，删重补缺，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集子；二、分门别类，编排了卷次和目录；三、将作者的原注和黄焯等人的批注、某些旧集的序跋之类、作品的写作时间，均录于作品前或后，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；四、标点；五、校勘。

现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：

一、这本集子收罗作品的数量多于此前的各种集子。与湖北文史馆所编的钞本（下简称“鄂钞本”）相比，

诗多300余首,词多40余首,文多100篇。文体也较全,如四言诗、六言诗和对联等,鄂钞本未收。

二、编排顺序有所改进,便于检索。按文体分三大编。第一编文录,又分九卷,按论著、序跋、书牘、赠序、寿序、传状、志铭、杂记、哀祭、颂赞、杂文、辞赋、政论、时评排列;第二编为诗钞,分七卷,基本上按旧有集子的时间顺序排,旧集中遗漏的诗作为“补遗”加上;第三编为词钞,分五卷,按《緇华词》、《揽蕙词》、《緇秋华室词》、《楚秀庵词》四种旧集的顺序排,未入旧集的词作“补遗”编为第五卷。各编均有作品细目,鄂钞本无。

三、列出了有关资料,便于研究。旧集中的“附注”和“说明”之类,尽量收入。如在黄念田、陈允贞校录的《黄季刚先生所为诗》第一集中,黄侃于《朔风篇》后的自注等。旧钞本中已标明写作时间的,均仍其旧。“鄂钞本”缺少这类材料。

四、参照众本校勘文字,并出校记。如黄侃的绝笔诗《乙亥九日》,各本文字颇异。黄焯《黄季刚先生年谱》为:

秋气侵怀正郁陶,兹辰倍欲却登高。

应将丛菊沾双泪,漫藉清尊慰二毛。

青冢霜寒驱旅雁,蓬山风急扞灵鳌。

神方不救群生厄,独佩萸囊未足豪。

“鄂钞本”:“正郁陶”作“兴不豪”,“倍”作“更”,“青冢”句作“西下阳乌偏灼灼”,“蓬山”句作“南来朔雁转嗷嗷”,“不”作“莫”,“独佩”句作“系背萸囊空自劳”。从遗稿墨迹看,黄焯所记当为定稿。象这类校注资料对研究黄侃诗文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书稿编成后寄上海古籍出版社,后又转至山西人民出版社,迄今未能面世。目前内地出版的只有“鄂钞本”。另有潘重规编录的《量守遗文合钞》,收录数量比“鄂钞本”少,但注释略多,在台湾印行;黄念蓉编印的《量守居士遗墨》,仅收部分诗词手迹,在香港出版。以上三种流传都不广,鲜为世人所知。

黄侃的诗文既然卓有成就,为何又未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呢?究其原因有四:

一、黄侃以学者名世,研究者多注意其学术成就,很少顾及其文学创作;

二、黄侃本人也自称以学术为本,诗文乃“游观娱戏之余,偶然吟咏”,并囑人勿刻其诗词,并以骨牌为喻,曰:“设时无天九,则地八未始不可以制胜,然终为地八而已……天九古人已取去矣。”^①这自评是切实的,从总体上讲,旧体诗文的“今不如昔”,是历史的必然。

三、近代叙事文学逐渐取代了抒情文学的正统地位,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。黄侃用文言写旧体,部分作品艰涩难懂,这已不是当时文学的主流,不属近代文学史研究的重点,专家不愿为此着力。

四、长期以来重政治、轻艺术,重权位、轻作品等“左”的文学批评观,影响了对黄侃创作的公正评价。黄侃诗文中不乏爱国忧民、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篇章,但更多的是一般生活的描写和感受。对这类所谓“儿女情多、风云气少”的作品,研究者是不大注重的。

当前,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加深加广,文艺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更新,实事求是地评议黄侃诗文,对深入研究黄侃的思想和生活道路,对拓宽近代文学的研究视野,对正确认识古代文体在现代生活中的美学价值,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
黄侃的创作观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,他继承了“诗言志”、“言为心声”等传统文学观念,认为“文章本由自然而生”,“心生而言立,言立而文明,自然之道也”^②。他不同意道家“文以载道”的狭隘功利论,将文章变成宣传儒道的传声筒。他说:“物理无穷,非言不显,非文不传,故所传之道,即万物之情,人伦之传,无小无大,靡不并包。”^③可见,他认为文章是客观世界的反映,内容应是无限广阔的。他还强调,在反映现实生活时,真情实感是作品的灵魂。“回风美人楚臣赋,落叶残钟帝子哀。诗为伤离有真感,文能写恨是奇才。”^④在写作态度上,他反对“汨没真情”、“矫情独造”和“邯郸学步”、“雕琢苦吟”的作品;也批评浅薄率露、粗制滥造的文章。他说:“雕饰愈甚,则质日以漓;浅露是崇,则文失其本。又况文辞之事,章采为要,尽去既不可法,太过亦足召讥,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,尽奇偶之变而不滞。复古以定则,裕学以立言,文章之宗,其在此乎!”^⑤他自己的诗文创作正是这些观点的实践。

黄侃的诗文，是他心灵的自然倾吐，是他生活的真实记录。“不能哀艳不雄奇，一种劳人写恨诗。酒尽灯残那须说，看看吾鬓已成丝。”^⑥他生活的清末民初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，经历了民族危亡的苦难岁月，为拯救国家和民族，他曾大声疾呼，远去异国，宣传反满思想，抨击君主专制，成了辛亥革命的先驱。辛亥以后，他目睹国事日非，民困依旧，虽有心救国，却无力回天，于是从长远打算，他自觉地担起了弘扬中华文化、整理国故的艰巨任务，在斑斓驳杂的民族文化园地里勤苦耕耘，呕心沥血，终成一代名师。在学术之余，他常用诗文言志抒情。叱咤风云的少年壮志，心力交瘁的教学生涯，学问有成和亲友团聚的喜悦，战乱漂泊和妻离子散的悲凉，都形象地得以表现。

青年时的黄侃，投身革命，写出了一篇篇气势磅礴、发聩震聋的政论文，推动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。在这些文章中，他揭露了满清统治下国家的悲惨命运：“天地闭塞，四夷交侵，神州之民，既憔悴郁抑于东瀛群兽之下，奄然无复生气。”^⑦“民生之穷。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，山泽之农，浮游飘转之丐，通都大邑之神贩，技苦窳而寓食于人之百工，其趣异，而困苦颠蹇一也。”^⑧他指出造成这种危难局面的原因是：“满人窃据中夏，二百余年，毒盈乎七世，刑政苛残，网罗周布，华域遗黎，用不免于水火，摧抑憔悴，乃告无辜于天。”^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？当时的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论战，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王朝。黄侃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，对改良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，指出他们“借满汉平等之名以阴行庇满人之实”，列举了他们的七条罪状，并对每条都作了有理有据的剖析，将康梁党人批驳得体无完肤^⑩。他明确宣称：“是故今日之事，宜以逐满为莫大之漠。苦心焦志以求，尚犹虞其不给，宁有余闲高谈远大之事耶？噫嘻！兴兵伐罪之业，在吾国人之一心。”^⑪武昌起义前夕，黄侃在汉口《大江报》上，用“奇谈”笔名发表了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》一文，极力鼓吹暴力革命。此文集中表现了黄侃的革命思想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，从那字字如铁的短文中，我们仿佛听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，见到了武昌城头上的烽烟。此文一刊出，不过两月，武昌起义爆发了，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覆没了。

黄侃政论文的理论依据是资产阶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他还不是阶级论者。在种族和政治关系上，他说：“所亟者固当在种族之兴衰，而不在政治之良恶。”^⑫在推翻满清的方式上，他提倡行侠暗杀之道，说：“夫暗杀之事，较之军旅为优。”^⑬这些认识，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有差距的。黄侃毕竟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和思想家，他的思想能达到旧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境界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“三十华年隙驹过，雄心丽想两蹉跎。”辛亥革命后，黄侃已无心于政治，但爱国忧民之心，并未消退。这期间，他不再写政论文了，而以弘扬民族正气、继绝学、存国故，植邦本、固种性的国学事业为已任，笔耕不息，直至终身。在他五十年的生涯中，除学术文章外，还有不少文艺性作品，包括序、跋、题、赞、辞赋、诗词等。这些作品，大都文笔优美，声情并茂，是近代难得的优秀文言创作。章太炎曾给予高度评价说：“清通要练之学，幼眇安雅之辞，并世固难其比。”^⑭

诗和词这两种传统文体，为黄侃所酷爱。从他七岁写小诗《父作盐梅令》到绝笔诗《乙亥九日》，诗词伴随着他一生，忧国忧民的思绪也贯穿了他一生。在《上留田行·序》中，他说：“一念同侪日在水火，终不能噤而不言，因以幽忧之余，作为此曲。”曲中他叹息“唐虞尽汛扫，仁义将安陈”，指斥“硕鼠亦已众，宁念烝人饥”，赞扬“篝火出丛祠，大泽揭长竿”，充满了感时愤世的现实主义精神。象这类心系国家和黎民的诗作，还可以举出许多。

早年黄侃留学日本，思念祖国，《居东杂诗·自序》写道：

摇落羁留万里身，微词托意岂无因？

君看宋玉悲忧日，尚有闲情到美人。

他在这段时间里的诗，已不多见；词却不少，且多“美人香草”，以寄寓故国之情。如《寿楼春》：

去国已将一年，故乡秋色，未知何似。登楼眺远，万感填胸。古人有言，悲歌当哭，望远当归。无聊之极，赖有此耳。

看微阳西斜，倚层楼醉起，秋在天涯。怎奈乡关千里，断云犹遮。悲寄旅，思年华，问浪游何时还家？想故国衰芜，长亭旧柳，惟有数行鸦。推蓬鬓，惊尘沙。听寒风野哭，荒戍清茄。

换尽人间何世?海桑堪嗟。凉露下,沧波退,淡一江凄凄蒹葭。但遥想苍茫,招魂路赊,愁转加。

此词写于1910年,词人用清丽幽婉的笔调抒发了对祖国的深切眷念之情,读后给人一种清凄苍凉之感;与其政论文的激昂慷慨之风,相辅相成,同奏爱国调。此后,他的诗词,一直关心着国计民生,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或明或暗地在作品中有所反映。《闵乱忧生次汪逸感怀韵》等诗,描绘了“国乱互挤排”、“小人专国柄”、“自从宝鼎沦,灾患历时久”的混战局势;他对军阀混战愤怒不已,在《行路难》中写道:“十城荡荡九城空,大军过后生荆杞,枵哭秋原一片声,谁能不起乱离情。已知杀掠成常事,终美共和是美名。游氛蔽天关塞黑,易京滞留归不得。谁令虎豹守天阍?坐见豺狼满中国。”在这种争权夺利的纷扰中,黄侃并不注重谁胜谁负,以为人情狙诈,均属豹虎;他只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:“纷纷成败何须数,独为遗民诉不平。”(《乱后始至南京作》)“极目中原万里昏,苍生辛苦向谁论?”(《杂感》)“运逢水火民何罪?星判参辰帝不臧。”(《感事》)“欲为苍生挥涕泪,可怜客病已先深。”(《即事》)他始终与老百姓同甘共苦,在兵荒马乱的年月,挈妇将雏,贪病交加,先后飘泊于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北京、太原、沈阳等地,“心知危邦不可入,其奈饥火从中然。神州万里皆榛莽,岂能归去耕山田。儿童汝母掩面哭,生居中夏宁非福。不见西方方战争,以泽量尸犹未足。大地真如羿毂中,杀机遍布毋轻触。寄生且作莠上鸠,未死还须议饘粥。淅淅颼颼林际风,凄凄切切床前虫。枪声不起儿亦睡,老子独对书灯红。”(《书七月廿七夕事》)他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。特别是“9·18”事变后,民族危亡,国土沦丧,政府腐败,百姓遭殃。他对此愤懑痛楚,无以复加。“千秋烟翰媲鸾鹤,万里云山限戎马。危邦登眺足酸辛,触事悲怀倍难写。”(《与诸生游龙树院观》)“难写”也要写,如《书愤》:

枵哭秋风又一年,谁令辽海陷腥膻?

力微难挽沉渊日,劫尽真逢倚杵天。

此夜苍涛掀大地,今日碣石抵穷边。

受生何苦依兹土,欲向蒲龕问宿缘。

诗中,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屈辱求和的国民党反动政府。1935年10月6日,黄侃写了《乙亥九日》(见前文)这首著名的重九绝笔诗,那时,他已病入膏肓,但仍念念不忘日寇铁蹄下的骨肉同胞,自愧无力救助生灵。此诗为他平生爱国忧民的诗章,奏出了一段真切感人的尾声。四天后,诗人就在这幽愤之中离开了人世。

黄侃的生活道路曲折而坎坷,他历事多,见识广,思想感情丰富,文采过人。除抒写爱国忧民的主题外,也不乏描述人生旅途中的细节。骨肉之情,男女之恋,朋友之谊,师生之爱,天人之道,自然之美,都呈现在他的诗文中,丰富多彩,感人甚深,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。如《七月十五日》诗云:

法供盂兰饰几筵,楚乡旧俗至今传。

孤儿泪尽松楸远,愧向经龕礼目连。

诗中用“目连救母”的典故,表现了对亡母深切的缅怀,惭愧自己未能象目连那样恪尽孝道。

又如《鹧鸪天》:

别意经年似旧浓,梦回仍叹凤帏空。不知别馆三更月,今照高楼第几重? 悲落叶,听西

风,新诗吟罢更无惊。挑灯郑重裁笺寄,叙到归期带泪封。

一看便知是首“怀内”词,上阕写闺人念我,下阕写我怀闺人,情意缠绵,语辞清丽。

从1916年到1927年间,是黄侃家庭最不幸的时期,他亡母、丧妻、失子,苦不堪言,写了《母太夫人田氏事略》、《亡室生日设祭作》、《念楚哀辞》、《惠殇》等作品,凄楚悲切,抒发了骨肉生离死别之痛,令人不忍卒读。如《念楚哀辞》,是为哀悼他的不到三岁就夭折了的孩子而作的,他说:“诸子中唯此儿最不幸耳!潘岳曰:‘赤子何辜,罪我之尤’,嗟乎,嗟乎,尚何言哉!”篇中字字血,声声泪,如哽咽难诉,深得古人哀悼辞赋之精诚。

黄侃诗文中抒师生和朋友之情的为数也不少。他尊师爱生,笃守我们民族的这一优良品德。当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时,他写了《致教育总长汤化龙书》,为解救老师而呼吁;刘申叔去世,他写了《先师刘君小祥奠文》深表哀悼;孙中山逝世,他写挽联曰:“洪以甲子灭,公以乙丑丑,六十年间成败异;生袭中山称,死傍孝陵葬,一匡天下古今同。”表达了对领袖的无限敬爱。对友人和学生,他真诚厚道,如《刘仲莲哀辞》、《送宋教仁》、《寄北大诸生》、《怀陈君》、《喜吴生至》等,都充满了深厚的情谊。

吊古伤今，寄情山水，离愁别绪，咏怀物理是传统诗词的常见题材，黄侃这类作品也较多，往往写得隐秀深沉，耐人寻味。如《孝陵二首》之一：

百战驱胡虏，君真一代豪。

秦淮呜咽水，长是怨南朝。

诗中赞扬了朱元璋的历史功绩，讽刺了满足于半壁河山的南朝诸君，文词凝练，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。

黄侃诗文的丰富思想内容与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统一。其思想品性属我国传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族；其艺术形式属民族的传统文体，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调。他留下的百余篇散文，多为应用而作。姚鼐所分的十三类古文文体，他都写过。这些作品，格调高雅，契合古制。他的诗词，各体均备。古体诗从三言到七言，还有杂言和乐府旧题；近体诗五、七绝，五、七律，还有五言排律；词用了120多个词牌，小令和长调都有。他采用如此多的传统文学体式，并严格按照其特点创作，格律严谨，少有破例，甚至用韵，也遵《佩文诗韵》《词林正韵》之类，足见他古代文学功底之深厚，运用语言技巧之纯熟。

黄侃诗文的艺术风格，呈现出多样性与独创性的统一。他学习和继承了汉唐大家的文笔而发展为自己的风格，读他的诗文，既有“似曾相识”之感，又具“别有滋味”之韵。在传统文学创作的花苑中独放一枝。其论辩文正如陆机《文赋》所云，“精微而朗畅”，精微指说理透辟，朗畅指观点鲜明，文笔流畅。如《哀太平天国》开头写道：

满人窃据中夏，二百有余年，毒盈乎七世。刑政苛残，网罗周布；华域遗黎，用不免于水火；

摧抑憔悴，乃告无辜于天。皇天右我下民，眷顾于南，俾我太平天国天王洪秀金，提挈英豪，乘

时而起，威灵所被，罔不归心。因逾陆梁，出衡阳，略武昌，逐江涛而东下，建天邑于建康。当

斯之时，东南十余部，悉已囊括；西北之民，方喁喁南向，飭其边豆玄黄，延颈以待义师之至……

描述太平军发难时的情景，气势磅礴，所向披靡，读来人心振奋，与贾谊、韩愈、苏轼之文风一脉相承。

黄侃生于楚乡，长于鄂渚，对本土文学怀有特殊感情，他诗中多次表达出对屈原的崇敬：“楚骚读罢更挑灯，哀郢篇成恨岂胜。”他的辞赋，楚韵浓郁。如《刘仲莲哀辞》末段云：“集芙蓉兮为君裳，屑琼蕊兮为君帐，驱飞龙兮为君骖，桂枝殒兮秋风凉，白日晡兮楚山苍，君归去兮为乐康，人间世兮长相忘，魂有情兮来我旁，独夷迟兮吟青黄。”其仿古而具新意，浪漫主义格调直攀屈宋。

李白诗的豪放雄健，杜甫诗的沉郁顿挫，对黄侃影响很深。其七言诗《行路难》等，学习李；其五言诗《南望篇》等，取法杜，故深得诗仙诗圣之遗风。近体诗格律严谨，黄侃却运用自如，进入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艺术性强。他的七绝，高华雅丽，似杜牧笔墨。如《秦淮河泛舟》二首之一：

残月微灯夜泛舟，秦淮景物最堪愁。

而今莫问南朝事，劫后西风正一秋。

他的七律，更见工夫，情意缠绵，意境极美。他对李商隐深有研究，写了《李义山诗偶评》，他称赞：“制诗谁及玉溪生，独运深思写至情。自有微词同宋玉，何曾艳体比飞卿。”（《李义山》）他写七律刻意学李商隐，音律婉转，朦胧娟秀，深得李诗灵性。如《寓意》：

蓬岛烟霞隔几重，西飞青雀信谁通。

自从鸾镜分携后，长在蛾眉怅望中。

琼蕊无征人易老，玉环有愿誓难空。

可怜吹管秦台客，春心相思一倍浓。

又如《月夜独坐泔然有作》：

病里情怀梦里身，欲寻欢乐已无因。

流光着意催衰鬓，明月何心照恨人。

鹊绕空枝难自主，萤窥虚幌似相亲。

青天浩荡凭谁问，漏断钟鸣一怆神。

塑造了一种孤寂清凄的境界，把自己的哀怨深深地寄托于其中。

黄侃的词大都写于20年代以前，比其诗更花气力。他严格按传统“诗庄词媚”的观念，以为词“别是一

家”。其中多抒离情别绪,即使是重大时事,也表现得隐曲含蓄,寓于花月之中。其词风大体分两类:一类是清新明媚的小词,承韦庄、李煜、晏几道、秦观之余绪而光大之。如《浣溪沙》:

偶忆年时心字衣,彩云曾向月中归,重来门巷已全非。镜里既无鸾共照,钗头何用燕双飞,高楼不见见斜晖。

另一类则是深沉含蓄,富丽典雅的长调,上承周邦彦、姜夔、吴文英等格律派词风。如《贺新郎·秋恨》:

望远皆秋色,向天涯萧条万感,顿伤羁客。为问新来南飞雁,应忆青芜旧国。但满眼沧桑难识。休吊斜阳高楼外,算长安更在浮云北。谁念我,正凄恻。西风暗送流年急,叹金仙移盘未久,铅泪欲滴。漫道铜驼今方醒,还见长眠荆棘。纵蚁梦枯槐何益。化鹤几时仍归去,怕人民城郭非昔。思到此,恨无极。

将故国之思、今昔之叹,融于萧瑟的秋色之中;情意深邃,音律婉转,读之沁人心脾。

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。黄侃是学者型的作家。他采用传统的文学形式和仿古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,在文言与白话的交接时期,他是属于自觉地坚持运用文言的最后一代人了。他的文言文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自幼习古,长大好古,耳濡目染无非古,这已成了“可怕的习惯势力”,用文言写作乃是他的轻车熟路,他的职业又是整理国故,况且早期白话文并未普及,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改弦更张,用白话来创作。此外,他的文学语言观也有偏颇。他说:“言辞修润即成文章,而文与言讫于勿乖者亦有故。撰述之家求其文字之简当,或志在行远,亦必美其采章,简与美相承,自与造次口谈不能同状。……言在唇吻,随世迁流,文著于书,其性凝固,故自尔雅解诗书之诂,辘轳记绝代之言,常语趋新,文章犹旧,方圆异德,故雅俗殊形矣。”^⑦他强调文与言应有区别,文必修饰,凝固少变;言却随时地而多变,这是正确的。但是文的稳定也是相对的,文是言的加工品,言是文的基础,脱离口语的文最终必成死文。黄侃对白话文运动持反对态度,甚至说:“钝拙之夫,自愧不能文事,竟创怪说,以愚世人。人性懒惰,勤劬者少,从彼之说,既省精力,又得声名。”^⑧这就陷入了一种固执己见的误区。他自己的语言实践又恰巧成了这种观点的反证:象本文开头引的那些平实自然,高雅优美,语言晓畅的作品,为人们所喜爱;而那些古奥险僻,罗列典故,书卷气重的作品,令人费解,严重地损害了他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美学价值,这是很可惜的。

注 释:

① 刘贻《师门忆语》,见《黄侃纪念文集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②③⑤ 《文心雕龙札记·原道》

③⑥ 《丁巳杪秋追忆乙卯晦宿天津旅舍》

⑦⑧⑩⑫⑬ 《专一之驱满主义》

⑧ 《哀贫民》

⑨ 《哀太平天国》

⑩ 《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》

⑭⑮⑯ 黄焯:《黄季刚先生年谱》(未刊稿)

(责任编辑 张炳煊)